

G219.29
30



DENGXIA XUESHU
WENCONG

灯下，是学者灵魂安静栖居的所在，也是思想自由飞翔的地方。以此为一系列原创性学术丛书命名，意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倡导一种学术沉潜的努力与用心，同时也有对学者角色定位的明晰与期许。记得唐钱先生《述怀》诗中有云：『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这种意境，于今虽然难得，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它的向往。这样，我们时常迷茫的心灵中才会有一盏学灯高高挂起……

——
编辑人语

柳 珊/著

在历史 缝隙间挣扎

——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柳
珊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80647-709-8

I. 在... II. 柳...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1538 号

书 名:在历史缝隙间挣扎
——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
作 者:柳 珊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 行: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
字 数:17.5 万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ISBN 7-80647-709-8/I·450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份填补空白的研究报告

——柳珊的《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
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序

陈思和

柳珊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先在厦门大学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兴宅先生。我第一次与她见面是在美丽的厦大校园，那天晚上我做一个学术演讲，在回宾馆的路上，柳珊一直陪着我，不断向我提出各种学术问题。后来她告诉我她想考我所指导的现代文学博士生，大约是怕我担心专业的差异，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她指出我在自己文章中提到的“民间”一词的概念各有不同阐释，把各种自相矛盾的地方都举了出来，在我，似乎是穷于应对；在她，则显现了文艺学专业训练出来的辨析概念的基本功力。一转眼八年过去，柳珊现在是同济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成家立业，相夫教子，于公于私都有很好的发展，但在我记忆里，似乎一直定格在那个娇小身材、说话辣味十足的湘妹子的身影上。

第二年她通过了复旦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考试，在我的指

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她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论文题目：“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小说月报》是新文学发轫之时的重要刊物，研究者很多，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从1921年茅盾主持刊物实行改革开始着手的，没有谁关心过1921年以前的《小说月报》。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前十年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刊物，是旧文学的阵地，所以茅盾接受主编之职，是文学史上新旧文学斗争的标志性事件。在一言而蔽之的文学史观下面，《小说月报》的前十年就仿佛不存在似的，只有在讨论鲁迅早期的文言小说《怀旧》时不得不连带提到它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因此也不得不提到发表鲁迅小说的刊物主编恽铁樵的慧眼。但光凭这一点信息，似乎就可以让人感到，这个刊物隐藏在沉默下的不平凡的色彩。

柳珊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潜隐的色彩，并很快就确定了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应该说她的写作算是比较顺利的，当时最大的疑难似乎是如何突破文学史的传统观念。我有些担心的并不是她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因为她是学文艺学出身，对于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的金科玉律大约还不像本专业的学生那样根深蒂固，我倒是有些担心她对于新文学的传统和意义还没有充分的理解，贸然去写新文学的对立面，容易导致眼下一种研究倾向：即有意夸张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的作用。如果从研究者的逆反心理和社会上的解构意识而言，这样一种倾向也有它必然产生的根源，但它似是而非，往往能够掩盖事实上的真相与历史的是非观念，造成某种迷惑性。这样一种倾向，近年来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我与柳珊在讨论这个题目时一直希望她更加全面地看待文学史，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

惑。——随便举一个例子，她读了刊物上的作品后，提出了她的疑惑：她觉得像徐卓呆等人的初期白话小说所显现的语言能力相当纯熟，甚至比新文学初期的欧化语言更接近大众，那么，如果不发生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的发展是否会更加顺利？当时我正准备出国讲学，就把她的问题和相关材料带到了国外，她的疑难触动了我的思考，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现代短篇小说的研究论文，里面专门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我把徐卓呆的短篇小说《卖药童》里的白话叙事和鲁迅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里欧化语言的描写作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由此我进一步推出这样的看法：新文学的效果和特点，其实并不在于是否使用一般意义上的白话，因为晚清民初的一般传媒和创作已经通用了白话语体，这在古代白话创作方面就有传统；而新文学之所以“新”，在于现代人的意识开始冲击传统文人的替天行道或者才子佳人的意识形态，而语体的欧化正是这种新意识形态的载体，使人们在陌生的语体里感受到陌生的感情世界和陌生的心理世界。如果说追求现代性以及同时感受现代性的分裂是五四新文学的特征，那么，与其说新文学提倡了白话文，还不如说是提倡了欧化文，这些被后来更激进的革命文学论者所诟病的“非驴非马”的语言文字，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这正是徐卓呆等人的白话小说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样来解答《小说月报》前十年的白话创作与新文学的差距，不知道能否使柳珊的问题得以解决。但我后来发现在柳珊的论文里引用了我对徐卓呆的一些论述，而且在整体的研究论述中也没有过分夸大《小说月报》前十年的意义和作用，论文比较客观地总结和评价了这十年来《小说月报》所起的作用，可以

说,比较科学地填补了这段历史 and 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白。

在论文写作中,柳珊非常聪明地将她所攻读的两个学科的特长结合起来,从扎实的资料研究中获得理论上的提升,反之,文学史理论也在丰富的文学史资料的基础上得以确定性的论证。在本论文中,她由于着重研究了《小说月报》前十年的生存环境和文学环境,提出了一个“民初文学”的文学史概念;长期以来文学史家通常把“清末民初”视为一个板块来研究。而无意中往往强调了“清末”而忽视了“民初”。这在传统的文学史观念里也是正常的,因为在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环境下,把晚清的文学运动完全置于当时政治斗争的框架里进行研究和评价,它当然是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是随着民国建立,政治环境日愈黑暗,文人志士意气消沉,流连于声色犬马和私人感情纠葛,于是民初文学多颓靡绮丽之风,通常为史家所斥。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民初的创作,开始摆脱“欲新民”的政治心态,回到了人性的关心、自我的关心,当是文学审美自觉的开端。用我的文学史观念来分析,20世纪文学史始终有“共名”与“无名”之分,“共名”的时代是有了明确的主题(即主旋律),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无名”的时代精神现象则比较涣散,时代主题已经无法拢住所有的文学创作和精神现象,文学出现相对自由的状态。我以为民初文学正经历了20世纪第一个“无名”的时代,当时革命既成而又退潮,思想亢奋后进入消沉,小说创作不再为载道、为革命、为排满、为新民作宣传,反而与市场结合起来,“诲淫诲盗”之风愈炽,于是有《玉梨魂》、《断鸿零雁记》那样缠绵华美的经典言情小说,也有各类适应文化市场而生的白话体小说。虽然梁启超等“小说界革命”论者对此发出了忍无可忍的抱怨,平心而论,

从接近现代小说艺术的雏形来看,民初文学还是一种悄悄的回潮,积累了小说艺术的经验。可惜的是这一个“无名”时期实在太短暂,这些经验还来不及总结,就被一场更为猛烈的新文学运动所取代。一个新的“共名”的时代直接诞生了新的文学规范和新的文学历史。几乎从那时起,民初文学就注定要被遗忘或者曲解,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死角、一片空白。所以我特别赞赏柳珊在这部论文里所做的研究,她以《小说月报》为个案,逐一梳理编辑思想、文学理论、小说类型、短篇小说等各个领域的成果,实际上也是为民初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奠定了基础。

关于民初时期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如何确立,也是这部论文的一个主要理论贡献。《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它的早期编辑方针必然与商务印书馆及其主持者张元济的文化性格有密切关系。从历史上的情况来说,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政治上都偏向于保守。我过去曾探讨过这个问题,我把张元济、蔡元培等都视为一类人物,他们刚刚从传统的庙堂里走出来,比较成功地实践出一条民间岗位的道路,但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还留着庙堂知识分子的残余的因素,所以在许多历史关键口上仍然会回到庙堂的立场思考问题。但柳珊的看法正相反,她正面分析了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的保守态度。她指出:知识分子在民间化的过程中,他首先要摆脱的是庙堂的价值取向,即摆脱向某种政权力量一面倒的依附关系,形成自己独立的民间品格与立场,所以他在纷乱动荡的政治环境里,只能以保守谨慎的态度,在各种力量之间走钢丝,而不去接触过于激进的、不安定的社会力量。我觉得柳珊分析得很有道理,以这种分析,后来文学

史上出现的老舍、张爱玲、张恨水等都属民间现象的保守性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读这部论文感到很高兴，我的学生在某些理论探索中走到了我的前面，提醒了我的疏漏，补充了我的思想，也让我看到了理论探索的前景和可能性，激起我对文学史理论进一步探索的巨大兴趣。顺便，我还想提一下这部论文对我私人兴趣的一个补益。我父亲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曾爱好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做过报纸副刊编辑，写过不少文章，但这些历史我都是一无所知。他去世已近三十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从西安回家探亲，与我有过一次彻夜长谈，他回顾了他在中学里受到一位教师的影响走上从文道路。那位教师名叫张亦庵，他说张老师多才多艺，能弹琴作曲，又能绘画。他组织学生们办刊物《蓓蕾》，第一期的封面是他亲自画的，图为一个孩子手擎一枝花朵。他教学生们如何木刻、如何印刷、如何编辑。父亲说他患了很严重的哮喘，但一骑上摩托车，照样生龙活虎地带领学生参加童子军的军事演习。父亲受张老师的影响，毕业后编过刊物和报纸，张老师替他约稿，撰稿者有包天笑、严独鹤、周瘦鹃等人。“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后来的文学史上说的。”后来父亲早已不从事文字工作，他也搞不清楚文学史上的流派，但他告诉我有一本文学史上有张亦庵的名字，是属于鸳鸯蝴蝶派，他不明白，生龙活虎的张老师怎么是卿卿我我的“鸳鸯蝴蝶”。我当时毫无文学史知识，所以听过也就算了。后来自己也成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份子，虽于鸳鸯蝴蝶派没有专门研究，但读书时总在留意张亦庵其人，好像也无甚收获。这次读柳珊的论文，她却明白无误地查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许多小说理论、翻译和创作的张毅

汉,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张亦庵。而且她从郑逸梅老人的回忆里搜集的关于张亦庵的描述,与父亲的回忆留在我印象里的张亦庵完全相同,解决了我心头的一大悬案。其实张毅汉的文章我早读过,郑老先生也拜访多次,竟没有想到把张亦庵联系起来,真是愧煞也。

现在,柳珊这部论文要正式出版,我想它除了在前十年的《小说月报》的翻译、弹词等方面的研究还有欠缺以外,其他部分都是相当成熟的。(其实柳珊研究生毕业已经有年,本来是可以进一步把这些缺漏部分补充进去的。)这部论文的出版一定会给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气象、新的高度,也显现了新一代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深度。我衷心期待着学术界对柳珊这一代新研究者成果的关注。

2004年8月5日

目 录

一份填补空白的研究报告·····	陈思和(1)
导 论·····	(1)
第一节 “民初小说”概念的提出·····	(1)
第二节 民初小说:从传统走向现代 ·····	(9)
第三节 民初小说的过渡性特征 ·····	(20)
第一章 《小说月报》与商务印书馆 ·····	(33)
第一节 《小说月报》创刊时的商务背景 ·····	(33)
第二节 《小说月报》的革新 ·····	(45)
第三节 商务影响下的《小说月报》民间立场 ·····	(60)
第二章 《小说月报》的编辑 ·····	(68)
第一节 概 述 ·····	(68)
第二节 王蕴章编辑时期 ·····	(71)
第三节 恽铁樵编辑时期 ·····	(79)
第四节 《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刊物吗? ·····	(85)
第三章 《小说月报》的文学理论探索·····	(102)
第一节 《说小说》与近代小说理论的转型·····	(102)
第二节 新旧杂糅的民初小说观念·····	(113)
第三节 民初小说翻译意识的转变·····	(128)
第四节 张毅汉的小说理论·····	(144)

第四章 短篇小说崛起中的生力军·····	(160)
第一节 近代报刊业与短篇小说的崛起·····	(160)
第二节 《小说月报》中短篇小说的总体风貌·····	(163)
第三节 《小说月报》中的主要短篇小说创作·····	(166)
第四节 结论与反思·····	(176)
第五章 《小说月报》中的小说类型研究·····	(181)
第一节 人间生活场景中的言情小说·····	(181)
第二节 进退维谷的道德伦理小说·····	(197)
第三节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末世文人的哀歌 ·····	(213)
结 语·····	(226)
主要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6)

导 论

第一节 “民初小说”概念的提出

在清末民初小说界,“小说”一词的概念极为宽泛。它除了我们今天所指涉的相对于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小说门类外,还包括了弹词、戏曲、传奇等边缘性文学体裁。所以,这个时期以“小说”命名的刊物,如《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等,在刊载小说的同时,也刊有大量的弹词、传奇。但本文所指的“小说”概念仅仅指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体,它以叙述为主,具体表现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和意识流等,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表现手法最丰富、表现方式也最灵活,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可以并用,也可有侧重;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基本手段。^①这样,弹词、戏曲、传奇这类讲究一定程式化艺术创作手法的文学门类自然被剔除在外。

^① 《辞海》“小说”条,第187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施蛰存在《“小说”的历代概念》一文中曾对古今中外的“小说”概念进行了归纳分析。他总结“近代小说”的特征是:“(1)故事是虚构的,有创造性的,不用社会实事。(2)故事有情节结构(plot)(现代派作家已否定了这一项)。(3)人物性格有典型性。”《中国近代文学争鸣》,第149—154页,上海书店1989年版。

民初小说即是指民国初期诞生的小说。

在当前的文学史研究中,除极少数学者使用过“民初小说”这一词语外,有关民初小说的概念界定和意义内涵的挖掘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学者们要么简单地用“鸳鸯蝴蝶派小说”来指代民初小说;要么干脆直接用“清末民初小说”去笼统地涵盖民初小说,因为与清末小说相比,民初小说几乎不值一提。当前文学史对民初小说较为权威的论断有:

清末小说是启蒙的,企图参预社会政治的进步,境界开阔而粗豪;民初小说则是媚世的,只求描写生活琐事以博读者的笑谑和伤感,境界狭窄而酸软。^①

民初小说之所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轻视,一方面是因为相比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声势和创作实绩,民初小说界的确显得寂寞暗淡得多。它缺乏像梁启超那样赫赫有名的小说批评家和一套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新小说”理论,也没有曾朴、刘鹗、李伯元这样优秀的小说家,更找不出一部可以与《老残游记》或是《海上花列传》之类并驾齐驱的小说作品;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民初小说的确不同于晚清小说,两者很难统一为一个整体。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曾提出过这样一种文学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史是一条载道与言志两方互相争斗、此消彼长的河流。载道期过后,言志期紧跟而上,两者的作用和价值各不相同,难分高下,可正是它们的合力推动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了这条河流的变化与前进。^① 如果我们对这一论点的简单粗率暂且忽略不计,而接受其相对合理性的一面,那么 1912 至 1917 年的文学则是“言志”的文学。它既没有独领风骚的光辉人物,也没有名垂千古的文学创作,而且由于社会状况的极度不稳定和持续时间的过于短暂,它甚至不能像其他“言志”时期的文学那样,生发出一批精致而耐人寻味的文学作品。

然而,民初小说和其他“言志”时期的文学一样,仍是个人性特征非常明显的文学,只不过就大体趋势而言,它的个人性特征是通过“寻道来载”体现的。有专家曾指出:

在民国初年的社会中,各种价值意识自由滋长着,而任何一种价值意识显然都无法得到社会的普遍拥戴而成为社会规范(Norm)。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体似乎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与力量选择行为,同时也显然受到其他人或团体的价值贬抑,不能为自己找到强有力的社会价值的支持。^②

这即是一个典型的“无名”^③ 时代。可这个无名时代与以往的无名时代不同。大家并非自觉自愿地守护自身所处的时代,而是想尽快结束这种无名状态,找出一个“名”来使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前进。所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竭力想拥有一个令人信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 17—18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史》第一卷(1800~1949),第 296 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③ 所谓“无名”指的是某个时代,有多种主题并存,与其相对的“共名”,指的是时代含有统一而重大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详细论述可参阅《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共名与无名》一文。

服、大家共同参与的时代主题,让它成为“道”的新载体。这样,那时的“无名”状态是无可奈何的,是焦虑的,同时也是“共名”即将到来前的“无名”状态。只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里,这样的时代主题一时难以形成。于是,大家“寻道”乃至“载道”的过程都注定只能是多样性和个人性的。

相反,“五四”和晚清却是一个“共名”时代,对应于文学史,则属文学史上的“载道”期。晚清的文学运动与创作都鲜明地体现出文学救国的政治色彩;五四新文学运动更是高举反传统的大旗,要求启蒙、民主与科学的呼声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共名”。晚清与“五四”这两个时期的“载道”内容除相同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外,其中心意向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文学形式上的特征同样相距甚远,仿佛是两种来自不同语言系统的文学。可由于有了民初这一段“言志”期文学的调和缓冲作用,这才使得晚清和五四新文学这两种“其差别是那样深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们产生于同一民族”^①的旧新两种文学现象相联系,并且为旧文学在受到新文学的沉重打击后,仍能在文学史上保留住一块自己的园地打下了基础。^②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能迫使新文学私下里也不得不向某些“言志”的旧文学作些妥协让步。^③

① [捷]普实克《从中国的文学革命看传统的东方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的冲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第14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如陈瀛一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青鹤》杂志,呈现出了明显的旧文学趣味。见魏泉《旧文人:现代文学中的另类存在》一文,载陈平原、山口守主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第158—181页,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③ 这样的例子在新文学作品并不少见。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及“孤岛”时期的张爱玲小说。

民国初年相对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其他年代,是一个小说兴盛发达的时期,其规模阵容并不逊于晚清。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书中的统计,其创作和出版的数量已经超出了晚清小说。民初出版小说的总数,国内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据袁进估计,民初小说在种类上可能少于晚清小说,但因为民初以小说为主的文艺期刊达五十多种,大大超过了晚清,所以总的数量并不少于晚清。^①加之小说文体与近代报刊业之间天然的亲和性,它便充当了当时中西文化急剧交流碰撞情境下的急先锋,其发展速度之快、变化轨迹之鲜明,使它成为了民初文坛里的“重头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方言小说、翻译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科学小说、政治小说等不同语言形式和题材主题的小说文体溢彩流光,层出不穷。诗歌、散文等古典文学体裁虽然仍为文人创作的主要文体形式,像王闿运、陈散原等人的诗,章太炎、林纾等人的古文,在当时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可相对于古代的唐诗宋词和较近的清诗及清代桐城派古文,民初文坛诗文的衰落不振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晚清和民初是文学史上两个“小说的时代”。也就是说,民初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门类是小说。

民初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独立研究的价值,其潜在原因是:以今天后置的眼光看去,五四新文学运动至少在表面上给中国文学的自身传统造成了某种“断裂”,中国文学创作的诗文传统

^① 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3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只能以潜在的方式寄居或沉淀在新文学样式中。相对而言,小说文体在民初文学界处于由边缘向中心位移的特殊位置,一时间还难以与诗文等正统文学门类相抗衡。如民初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的文学创作就主要集中在诗词上。二十三册的《南社丛刻》中小说仅占一册。因此,相对诗文来说,小说文体所受到的成规束缚无疑要小得多。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五四”前后,由五四新文学运动造成的中国文学的非历史性、非连续性因素在小说文体中表现得并不特别突出,相反,它所凝聚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连续性特征较之其他文学门类更为鲜明丰富。

然而,民初小说的整体情况异常复杂。这是因为,在晚清到民初的二十多年间里,几乎所有的小说理论、批评和创作都首先出现在小说杂志或报纸上。绝大多数小说,即使是单行本小说,最初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这便使得当时的小说创作良莠不齐,且版本混乱。

晚清以四大小说杂志为核心,它们各有所长,各有所向,但大致能够统一在“新小说”一面旗下。相比之下,民初小说界一方面缺少一个可以让它们黏合在一起的时代“共名”,另一方面又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商业化趋势和由此带来的传播媒介的变化,^①再加上1917年后兴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民初小说在这样的境况下要坚持和推进自己的独立特性必然困难重重,

^① 此时的中国传播媒介正在步入大众媒介的时代,传播的方式、范围与速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是“媒介即信息”,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感知方式的变化,可以说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观点可见他《理解媒介》一书。对小说文体受传播媒介影响分析得很清晰的是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